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关于 “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

郭文倩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五四运动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是当时知识分子十分关切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其成员参与了这场论战,并且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通过辩驳和争论,他们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断定开发实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在论战中所呈现的观点为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中国;辩论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4-0029-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4.005

The Debate on “Whether Socialism Applies to China” for the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GUO Wen-q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how to reform Chinese society became a issue of great concern for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Around this question, the early Marxists launched a socialist debate with the Kilt socialists and anarchists. Members of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the earliest to study and publicize Marxism,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and launched a debate on “whether socialism applies to China”. Through rebuttals and arguments, they solidified their belief in Marxism and Socialism,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must rely on Socialism, firmly believed that only scientific Socialism can develop China, and stressed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views presen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in the debate laid a goo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Marxism Research Society; Socialism; China; debate

回望百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阵地。其作为五四时期我国第一个研究和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社团,在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中占据着显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表现在研究会对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作者简介:郭文倩(1998—),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而且还体现在其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1]。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历史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两次研究高潮^[2]。旅英学者李丹阳^[3]探讨了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认为研究会“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他还指出研究会成立时间是 1918 年。但是,张立波^[4]认为研究会成立时间应为 1920 年。赵玉兰^[5]认为,研究会“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内化到广大北大学子的心田,从而为中国的革命实践培养了坚定的革命力量”。已有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对研究会成立时间、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历史作用等方面的考察,较少对研究会成员参与各种论辩活动开展研究。然而,高正礼^[6]言,与一般的课堂教学和演讲报告等活动相比,在辩论、争论中所呈现的观点更能体现研究会成员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水平,而且这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论战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此,本文拟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参与社会主义论战相关史实进行研究,首先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概况以及其发起“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辩论会的原因、产生的效果,然后提炼研究会成员在社会主义论战中争论的主要问题,最后探讨研究会成员参与论战对于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及意义,以期对当前和今后工作中如何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概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局面。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十分关切中国问题和出路,由此促成了社团的蓬勃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活跃于思想界、政治界的主要社团之一。

1920 年 3 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由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组织发起,其他发起者包括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

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当时,为防止招致“干扰和非议”,研究会成立之初则“保持秘密状态”^{[7]326}。直到次年 11 月 17 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发起启事,才正式对外公开并开始从校内外招收会员。校长蔡元培应邀出席了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同意拨给研究会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其中一间就是作为阅览室兼编辑翻译室的著名的“亢慕义斋”^[8]。

根据公开刊登的启事及研究会成员的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开展活动。

一是理论学习。按照罗章龙^[9]在《椿园载记》中的说法,研究会设立了十几个专题研究小组,会员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加入一个或数个小组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而且根据发布的规约可知,研究会每周六晚 7 点定期举办讨论会,一般先由一位会员讲解某一专题的内容及要点,然后其他会员对此展开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上述活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得以快速提高,而且在学习和研究中获得的科学理论知识成为他们日后认识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石。

二是著作翻译。朱务善^{[7]327}在其回忆中说,研究会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相关研究著作。起初,研究会成员仅能通过阅读和翻译北大图书馆的书籍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公开之后,其发起者筹集购书费,购备了英文、德文、法文三种版本的《马克思全集》,后经过集资或募捐,研究会拥有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和杂志百余种。研究会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将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为其他成员提供中文版的研究资料。罗章龙^[8]在回忆中提及,研究会还曾有一个名为“亢慕义斋”的译书规划,专门进行马克思列宁相关著作的翻译,这客观上便利了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三是公开讲演。高一涵^[10]在回忆李大钊的文章中提到,研究会除了进行翻译和讨论活动外,还对外“举办讲演会”,时间一般定在每月月末,讲演人均为当时的名人学者。根据罗章龙^[11]的回忆,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的题目是

“马克思经济学说”,由李大钊担任讲演人。其他主题讲演活动在刘仁静^[12]等的回忆中也有所提及。研究会还组织过一些辩论活动,其中反响最为热烈的是一场题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7]328}。

二、研究会组织辩论会的原因及产生的效果

(一)组织辩论会的原因

“五四”前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执有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进行着激烈的思想较量,其中,因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分歧,以李大钊、高一涵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之间出现了道路选择上的分野,由此,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论争。

20世纪20年代,张东荪、梁启超等以其理论阵地《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杂志为主要依托,极力赞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前,他们打着研究社会主义的旗号在中国隐晦地宣扬社会改良主义。随着罗素来中国讲学日期的临近,他们便“名正言顺”地开始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13]。1920年10月,罗素抵达中国并开启了他的讲学之旅,梁启超委托张东荪接待陪同^[14]。一个月之后,张东荪发表了一篇仅有五百字的短评,主要阐述了他陪同罗素讲学的过程中受其启发而产生的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认识:唯有“开发实业”才能救中国,而不是“空谈主义”^[15]。这篇时评的发表意味着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由大力提倡转变为暂时搁置。随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社会主义商榷”一节中也阐述了与张东荪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对当时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针对社会实际状况,应找到合适的具体“实行方法”,即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在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谈论社会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应该先“全力发展生产”^[16]。

张、梁等人借罗素之权威,批驳社会主义,公然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激起了早期马克

思主义者的不满。研究会成员纷纷下场予以驳斥,其他知识分子也对此进行了回击。比如,李达、陈望道分别发表文章对张东荪的言论进行严厉批判,指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主张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正确的出路;陈独秀将13篇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信汇编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特辑,并刊登于《新青年》,甚至在《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反驳张东荪的观点,认为“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这种论调“未免令人发笑”^[17]。因此,在中国思想政界围绕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爆发了一场五四运动以来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由此组织了为期两天的“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

(二)辩论会产生的效果

辩论会在北京大学沙滩红楼的一间大教室里举办,题目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辩论会的主要参与者为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分赞成与反对两派展开辩论。李大钊出席辩论会并担任评判员,在评判中,他立足唯物史观,阐释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总结了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经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的历史必然性^{[7]328}。另外,针对反对派指出的种种质疑,李大钊认为借用河上肇的“雏鸡比喻”可进行有效回应,他指出:“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7]328}

辩论会在青年学生当中反响热烈,比如北大学生费觉天在会后激动地向朱务善赞扬李大钊“一针见血”地“以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到来”^{[7]329}。而且辩论会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精准科学的阐释,使更多的青年人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甚至有一些曾经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在论战中争论的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时呈现了多元化的态势,

而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进步知识分子一直极力寻找最适合中国实际的学说。在社会主义论战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局限于利用这场辩论会表明立场,其成员除了采取组织研讨、讲演、辩论等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外,也试图通过报刊媒介传播研究会的思想。从其成员发表在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论战中争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如何开发实业

如前所述,张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际,公开发表对中国出路看法,认为开发实业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强调中国唯一的弊病是贫困,大多数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在此情形下,没有谈论主义的资格,“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对于如何开发实业,张东荪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有利于“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他认为,中国的劳动者由于数量较少,难以形成有政治影响力的阶级势力,打倒军阀要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且在现有基础上,要顺应绅商阶级的兴起趋势,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借以逐步消灭并取代军阀势力,届时,劳动阶级随之发展,可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就主张以社会主义开发实业则“太越阶了”^[18]。

梁启超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他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现状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欧美国家之所以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是为了争取多数劳动者被掠夺的利益,改善劳动阶级的地位,而我国“今日之大患”,是大多数人民想要谋求一份维持生活的职业“且不可得”;社会主义运动用于解决欧美问题能“一针见血”,而对于中国则是“隔靴搔痒”^[19]。

可见,张、梁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想要开发实业只能依靠资本主义,他们试图以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高一涵对此表达了不同看法。他首先承认充足的资本是扩大生产的必要条件,表示了对张东荪所提“增加富力”的认同^[20]。但高一涵所提倡的“增加富力”是增加资本,而不是依靠资本家,更不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当资本为私人所有时,便会产生资本阶级和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增加富力”只能增加私人的财富,并不能改变劳苦大众“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的现状,因此“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鉴于我国现行的社会状况,中国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在“注重生产”的同时要“注重分配”,并进一步指出,欧美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造成贫穷的阶段”,正是因为只“注重生产”,而要治疗中国社会的病症,就要规避这样的弊害,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应当研究“改造的方法”,而不是武断地抄袭欧美国家的发展史^[20]。高一涵对社会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看法和对生产分配问题的科学阐述构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中心内容。

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应该开发实业的看法,李大钊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振兴实业的必要性^{[21]49}。但与高一涵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李大钊认为,中国不是没有资本,而是资本过于分散,中国的富人不愿意拿出钱财来开发实业,也不懂得怎样合理利用资本;中国现行条件下的资本存在着“零碎散乱”的弱点,但是可以通过“平民专政”的方式“强行搜集起来”,集中力量兴办实业。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纯粹生产者组织”的政府,以此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抗“世界的资本主义”^{[21]49}。

何孟雄则对梁启超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发实业的想法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资本主义“归少数人享其利益”,这会造成社会上出现资本家和一些少数特殊阶级;而社会主义却是以“人人都享同一的利益”为目的,平均分配一切利益,消除特殊阶级。对于中国开发实业的宗旨,他指出,我们在谋求“自己民族幸福”的基础上,还要帮助其他民族,从而使全人类摆脱目前的落后境遇。这一看法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理念。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发展自己的实业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以抵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市场侵略。而且他

还通过比较英国、法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提出在世界各国“都想扩充市场”的大背景下,中国本土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因此在中国依靠资本主义开发实业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2]。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建立劳动团体,联合“世界劳动团体”,以打倒资本家,实现民族的自由和平等^[23]。

从高一涵、李大钊、何孟雄在争论中所呈现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反对开发实业,而是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实行资本主义开发实业这一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的客观分析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认识,提出开发实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凸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先进性。

(二)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

对于中国“是否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张东荪指出,资本主义是不能跨越的历史阶段,现阶段只有采用资本主义,在“较远的未来”才能实行社会主义。他重申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为对社会主义应分“信仰”和“学问”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只需“热烈的感情”,而不需“真理为其依据”;而“学问”上的社会主义尚待“创造修改”,“迄今未建大成”。换言之,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还未发展成熟,不能指导中国进行社会改造,现阶段要“积极地研究社会主义”,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24]。实际上,他反对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比较上最圆满”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发文驳斥了张东荪“资本主义必兴”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方面已经满足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文中,他又以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为例,佐以证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分别从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两个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 possibility。他认为,中国顽固的官僚势力是“掣肘实业”的重要因素之一,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中国实业会导致中国沦为“外国

资本家的掌中物”^[25]。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是对外来思想的盲目接受和教条复制,而是在发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后,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并结合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独立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高一涵指出资本主义并不适宜于中国,能够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他抨击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的说法,直指这派人的根本错误是过于机械地看待历史的进化。他提出,“历史的进化”不仅是由“经济生产状态”所引起的“物质变化”,往往还包含意识形态的变化,历史的前进离不开“人类意志”的推动,历史是人类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下产生的“智识的创造物”。他认为,西方欧美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时,缺少历史经验,“走错了路”,“跑进了资本主义时代”;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制,却没能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反而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凋敝,国内外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已经显现,而社会主义正在针对其“下药医治”,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应该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医治或预防”,而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到来推行资本主义这种“削足适履”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时代”的到来不必一定“从资本主义的时代经过”^[26]。由此可以看出,高一涵认为中国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与李大钊的看法不谋而合。

上述研究会成员诠释了中国已经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从中展示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试图寻求富国强国道路的强烈愿望,显露出他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志向。鉴于李大钊、高一涵等在政治界的影响和学术界的声望,他们对于“中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做好了理论准备。

(三)是否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几曾在《改造》上写道: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便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予以了驳

斥。1922年1月15日刘仁静在《先驱》创刊号上以“剑”为笔名发表文章,凭借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运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论述驳斥了徐六几关于马克思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谬论,称徐六几的观点是对经典著述的断章取义。随后徐六几在《时事新报》上撰文辩解,张东荪撰文随之附和。之后刘仁静又发表《答六几和东荪》坚决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提出马克思的观点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现实变化逐渐向前推进的,并非前后矛盾,应该用动态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26]。他在有力反驳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观点的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理论品质,这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刘仁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变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同期革命者中处于领先地位。

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的并非刘仁静一人,邓中夏也是其一。1922年1月15日,邓中夏以“重远”为笔名在《先驱》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采取“译”“述”结合的方式,摘译了大段《哥达纲领批判》的内容,并指出,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终极的政治观念”是不谋而合的,而共产主义不仅拥有无政府主义所具有的好处,同时还兼具无政府主义不具备的优势。文中他借助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两者不同:共产主义呈现了具体的步骤、手段和方法;无政府主义只有空泛的“终极理想”,缺少对“实际事实”的关注。邓中夏的论述使无政府主义脱离实际的弊端暴露无遗,给当时那些分不清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以深刻启示。他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论证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在其专政统治下,建立符合中国当下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可以为国家的过渡或消亡创造条件^[27]。由此可见,他主张社会主义、驳斥无政府主义,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加深了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通过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以刘仁静、邓

中夏为代表的研究会成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走向理论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研究会成员参与论战对于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与价值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针对“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这一话题展开了诸多争论。他们在争论中所呈现的观点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会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前提。

(一) 确认了社会主义适宜于中国

通过思想的不断交锋与碰撞,研究会成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适宜于中国。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判断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认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历史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提出了开发实业必须要依靠社会主义。同时,阐明了中国已经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认定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

(二) 排除了其他学说的干扰

研究会成员深刻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指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正确的出路和光明的前途。在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时,研究会成员揭露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并指出改良主义并不是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良方;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中,研究会成员深刻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的谬论,由此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思想界和政治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中国社会在后续发展中受到其他学说干扰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构成复杂,经过论战,很多其他主义的追随者退出了党的队伍,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变得更加纯洁,从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28]。

(三)开启了如何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经过此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开启了如何在我国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他们更加重视现实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具体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命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过程中所阐明的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后续革命事业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五、结语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阵地,在学术上具有辉煌建树,在政治上拥有先锋地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该研究会为阵地,在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同时,同非马克思主义者针对“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相比的优势性和真理性,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和希望。

站在新的时代起点,深入探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仅有益于我们巩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有助于抵抗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恶意侵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风险和挑战。此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五四时期青年人为中国未来追求进步、为红色信仰投身革命的阵地,其成员在寻找中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所作的不懈努力,也会激励鼓舞新时代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参考文献:

- [1] 曹玉华.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活动探源[J]. 兰台世界, 2014(16): 27-28.
- [2] 金梦.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述评[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12): 93-102.
- [3] 李丹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J]. 史学月刊, 2004(6): 51-59.
- [4] 张立波.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基于史料的重构[J]. 哲学动态, 2014(2): 22-29.
- [5] 赵玉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新探[J]. 高校理论战线, 2008(8): 44-48.
- [6] 高正礼. 论争中的觉悟: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之争及其意义[J]. 党的文献, 2011(5): 59-65.
- [7] 朱务善. 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G]//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共产主义小组(上).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8] 刘岳. 1920年3月: 别样的书斋、使者与诗歌[J]. 前线, 2020(3): 92-93.
- [9] 罗章龙. 椿园载记[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9: 57-72.
- [10] 高一涵.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五四运动回忆录.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54.
- [11] 罗章龙.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G]//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一大”前后(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94.
- [12] 刘仁静. 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G]//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共产主义小组(上).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321.
- [13] 孙建华. “社会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论[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6): 43-48.
- [1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906.
- [15] 张东荪.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N]. 时事新报, 1920-12-15(1). (下转第42页)

- 京:外文出版社,2018.
- [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8-109.
- [1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2-07-28(1).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3]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7.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5]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4.
- [1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94.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77.
- [21] 郑艳凤. “中国话语”确立过程中的几个关系[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29-34.

(责任编辑:白丽娟)

(上接第 35 页)

- [16]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5.
- [17] 陈独秀.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G]//新青年社编辑部. 社会主义讨论集.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22.
- [18] 张东荪. 现在与将来[N]. 改造,1920-12-15.
- [19] 梁启超.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N]. 改造,1921-02-15.
- [20] 高一涵.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的我见[N]. 评论之评论,1921-06-20.
- [21] 李大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N]. 评论之评论,1921-03-20.
- [22] 何孟雄. 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甚么方法? [J]. 曙光,1921,2(2):50.
- [23] 王相坤.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何孟雄篇[J]. 党史文苑,2020(7):29-37.
- [24] 张东荪. 一个申说[J]. 改造,1921,2(2):36.
- [25] S. C(李大钊). 社会主义下之实业[J]. 曙光,1921,2(2):38.
- [26] 剑. 答六儿和东荪[N]. 先驱,1922-04-15.
- [27] 邓中夏. 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N]. 先驱,1922-01-25.
- [28] 陈独秀.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G]//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一大”前后(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责任编辑:李秀荣)